

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之困境及启示

赵海峰

(中共中央编译局,北京 100032;黑龙江大学 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哈尔滨 150080)

[摘要]技术理性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理论。它的理论来源是韦伯的技术合理性思想和对西方社会科学技术崇拜的忧虑,面临着理性的崩塌和解体、人类精神的分化,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从不同的理论路径提出了技术理性批判思想,但是都有着相似的理论困境,主要表现为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抽象性、局限性,以及理论上的决定论色彩和简单化思维。为了克服上述理论误区,必须扬弃简单的决定论思维方式,理解人类实践中的二元对立的深层根源,既要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也要对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和批判。不能进行抽象批判,而要深入历史;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不能进行简单化的处理;不能对技术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进行简单化的理解,不能片面地褒奖一方而贬低另一方,要清楚二者各有各的优缺点,都不是绝对的。技术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重新融合,一定要在人类实践的过程中加以解决。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实践的二元论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2)09-0021-04

技术理性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法兰克福学派作为第二代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以技术理性批判为核心,以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心理机制与性格结构批判为主要内容,对20世纪资本主义的意识文化层面进行总的批判。这几个主要的批判方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本文不打算过多地复述这些批判的具体内容,而是试图基于其内在理路和理论困境,提出一些深层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技术理性批判的起源:理性的降格与分裂

理性是西方哲学中最为复杂、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众多,旨趣不一,对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方向,其范式起源,当在第一代新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葛兰西那里去寻找。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的总批判。在19世纪,批判的方向主要侧重于经济、政治层面。20世纪,第一代新马克思主义者发现,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发生了明显改变,在经济和政治系统后面,还有庞大的文化系统。卢卡奇首先指出阶级意识的重要性,预示着理论和实践出现分离的危险。葛兰西随之提出了系统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革命的思路。文化批判和意识批判成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理论方向。

韦伯的合理性理论对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影响和启示是非常明显的。技术理性这一概念就可以看作受他的理论影响而产生的。韦伯认为,合理化是现代思维方式的特点,西欧自宗教改革以来,经历了一个合理化的过程。他用“祛魅”来说明这一合理化过程的实质:“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祛除巫魅。”

[收稿日期]2012-06-18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2011年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文化进步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1B031)

[作者简介]赵海峰(1972-),男,黑龙江桦南人,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从事西方哲学史及文化哲学研究。

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1]29}。西方传统哲学追求宏大的、无所不包的、整全统一的大写的理性概念,在现代思想中已经崩塌,导致人类精神的分化,大写的理性分化和缩减为小写的“合理性”。

韦伯的社会行为理论做出了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区分。前者只关注行为的结果或目的,后者只关注信仰和价值。这两者都是片面的,前者在形式上是合理性的,但是又有着实质上的非理性的一面,后者在实质上是合理性的,在形式上又是非理性的,二者互相补充、彼此平等、不可偏废^{[2]40,56}。技术理性批判是从韦伯对合理性的二分法中发展而来,精确的称呼应该是“技术合理性批判”。

技术理性批判的兴起是和20世纪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后的现实相伴随的。对科学技术的崇拜渗透到了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仅在于生产技术层面,也渗透到管理体制、人文学科以及人类精神的诸多层面。一切问题都有着化约为、转换为技术问题的倾向。美国的控制论专家卡恩为将来可能出现的技术开了一张清单,其中包括大批控制个体行为的技术,比如监视技术、控制个人和组织行为的技术、刺激大脑兴奋的技术、反暴动技术及控制疲劳、感情、情绪、幻想的药物^{[3]75}。科学技术给人类精神带来的种种危害,和对未来的上述想象,刺激了哲学家对科学技术的滥用进行反思。科学技术批判思潮包括了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文化哲学,乃至后现代哲学。新马克思主义在这股趋势之中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技术理性批判的内在逻辑和理论误区

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贯穿始终,但是具体表述各自不同,思路上也存在着差异。主要的代表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的《工具理性批判》、马尔库塞的《单面人》、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等。其侧重点互有异同。

《启蒙辩证法》从启蒙和神话的关系开始,探讨现代文明的本质,启蒙的目的是“为世界祛魅、瓦解神话,用知识来替代幻想”^{[4]3},但理性自身却取代了神话的位置。他们从古希腊开始分析理性精神的源头,试图从源头寻找技术理性的本源。但是,这种寻找方式本身却是非历史性的,古希腊时代和20世纪之间的不同被忽视了,如果把古希腊理性和20世纪科学理性简单地画上等号,就等于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去寻找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起源。这种探究方法已经明显地背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学者康纳顿指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神话转变为理性和前资本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这两种转变联结在一起,实际是,前一个转变在苏格拉底那里就完成了,这两种转变过程相隔数千年^{[5]110-111}。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似乎认为,只有靠对意识形态进行理论上的批判,才能完成马克思主义的目标,这种理论批判本身的非历史特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讲,可能是致命的。

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的反思和批判,是法兰克福同人中最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他不是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启蒙,而是肯定从启蒙运动到黑格尔的近代代理性思潮,他的理性观念是来自黑格尔,认为理性是人类思维的基础,哲学的目标是理性的复归。但是他在近代理性的基础上加入了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把技术理性和对本能的压抑结合在一起,提出了爱欲解放论。他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至上的现实,造就了一种奴役人的力量,人们的需要表面上被满足了,但是本来是全面的、多维度的人的本质,在现实中却被异化为单向度的、一维的、片面的人。控制的力量无处不在,科学与技术越发达、越全面,个人打破这种奴役状态的手段和方法越不可想象^[6]。这种逻辑似乎必然得出比较悲观的理论。

马尔库塞对现代西方哲学也进行了批判,批判的矛头集中在形式逻辑、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等方面。他认为,为了进行普遍的控制和计算,产生了各种精神和物质的手段,形式逻辑也可以被视作是这些手段之一。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因为采用了和自然科学相似的方法,也同样被马尔库塞指责为适应某种统治的形式,和技术理性有着内在的一体性^[7]。这种批判依然有着只攻一点、不计其余的特性,对被批判的对象造成了一定的误解。

哈贝马斯所撰写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和技术》对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进行了重新思考,提出了不同意见。哈贝马斯的思考,为我们反思技术理性批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他指出,技术的

发展并不是绝对的、异化的力量,如果这样简单地对技术进行分析,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科学技术的进步,本身已经形成第一位的生产力,从而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基础,这种新意识形态和旧的意识形态有着很大区别,它重新构造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对这种合法性基础,我们不能进行简单的拒斥,而应当寻找其内在逻辑,加以深层批判^{[3]69}。

哈贝马斯把解决问题的路径建立在他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的基础上。他用劳动和相互作用(交往)的概念,取代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概念。这个区分与韦伯对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区分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这个逻辑出发,技术的合理化(或合法化)属于生产力范畴,而制度的合理化(或合法化)却属于交往行为范畴。从表面上看,异化的根源是技术合理性,而实际上,真正的根源却是制度的合理性、交往的合理性。由此,哈贝马斯把问题的解决路径引入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理论建构之中。

哈贝马斯和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最大的区别,是他放弃了对资本主义技术理性及其全面控制的彻底批判态度,而以一种改良主义的方式,把革命和批判问题转化为交往行为的合理性问题。对这一转变,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或者否定评价,而应该看到,这正是基于对前者的技术理性批判本身局限性的认识。哈贝马斯把技术理性放在一个比较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框架中去理解,这种理解方式比起他的前辈来说,有其合理成分。但是,他的解决方案,仍然不那么令人满意。

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始终没有逃脱某一种决定论色彩。霍克海默等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种肯定性的思维方式如何形成并掌控所有人的分析上,没有摆脱某一种技术决定论形式,而哈贝马斯则另辟蹊径,从交往合理化的理论建构中寻找解决技术合理性问题的道路,又属于某种制度决定论和交往行为决定论的方式。这种决定论的思维模式,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反思的东西。

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具有一种浓厚的技术决定论色彩,但是不能归结为简单的技术决定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异常复杂,不能简单机械地理解决定和被决定这样的理论描述。但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一体化控制形式的分析则相对简单。这些不同的道路都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的分析框架。这种背离的合理性在于,马克思似乎是用一种类似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观来处理人类实践的演化过程,他的分析在宏观上无懈可击,但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上和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新形态有着相当大的距离,法兰克福学派则抓住了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新问题加以评说。后者采取技术理性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框架来分析现实,又的确简化了问题的复杂性。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是一种文化的批判、理论的批判,其中不可避免地导致抽象性的结果。这种误区我们应当警惕。

三、实践的多元论:走出技术理性批判的困境

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技术理性批判的起源,探讨韦伯的两种合理性思想的意义,以及超越决定论思路的途径。韦伯的两种合理性在西方古典哲学内有其前身,就是实践概念的多元论。亚里士多德关于理论知识、创制知识、实践知识的三分法导致了实践的多元论思路,哲学上所谈论的实践概念,主要分成两类,一类是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人类改造自然的的活动,它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创制知识”,另一类是人的伦理行为、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等,它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知识”。在一定意义上,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野从此肇始^[8]。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终极意义的传统理性概念土崩瓦解,技术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呈现出分化态势,二者的统一似乎遥不可及。这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许多哲学流派,都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马克思本人的思考中,技术的两面性未能得到充分展现,是和19世纪科学的高歌猛进有直接关系,马克思像所有19世纪中期的进步知识分子一样,相信科学技术是能够提供解决人类困境的钥匙。他对生产力在人类社会的决定地位的论述,一直招致各种各样的误解。不争的事实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最为强劲的力量。这导致大多数人都是从技术的逻辑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实践概念。我们熟悉的实践定义——生产实践、科学实验、阶级斗争——实际上是按照亚里士多德“创制知识”的思路来进行理解,这种理解方式天然地为技术理性的思维方式铺设了道路。中国改革

之中有“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提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正是技术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创制知识”和“实践知识”之区分的另外一种提法。

现代社会中的这种实践的二元分裂,更深刻的根源是人自身物质欲望和精神追求的分裂。技术进步实际上推进了人的物质欲望的无限增长,技术成为掌控人类欲望的最强大的力量。新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和技术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技术—意识形态”,只要人的欲望没有节制,意识形态控制就会一直是威胁人类达到自由解放的力量。在哲学史上,苏格拉底首次提出人生意义在于追寻美德的时候起,物质欲望和精神追求的矛盾就已经纠缠在人类的意识之中。20 世纪科技进步,只是把这个矛盾前所未有地放大了。从这个角度看,讨论技术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劳动和交往行为谁是决定性力量,意义并不是很大。

实践的二元分裂和人自身的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分裂能否克服,技术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能否重新融合?这一定要在人类实践的过程中加以解决,在全面发展的人的丰富性生成之前,这种克服和融合不能全面完成。我们不能因此停止对技术理性的各种批判努力,而是需要避免技术理性批判的偏颇之处。

首先,我们一定要遵循马克思的历史方法,不能抽象地考察技术理性和人之异化的根源,必须深入现实问题内部,去挖掘人之异化的具体根源。那种动辄上溯到古希腊时期的问题探讨方式一定要避免将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内的经验事实加以错误的套用和不加区别的分析。

其次,我们一定要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技术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等概念之间的关系不能被归结为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单向关系,而是复杂的彼此并存、互相影响的关系。描述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必须慎重再慎重,避免简单化的理解方式。惟其如此,才能避免理论批判和文化批判所遇到的某种决定论困境。

第三,我们不能将技术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加以机械的分割和对立,不能认为技术理性就是异化的唯一原因,在价值上是完全错误的,同样也不能认为价值合理性本身是绝对正确的。我们要注意到:二者本身应该是人类实践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不能用一方面来压倒和取代另一方面。按照韦伯本人的看法,二者都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合理性,都是片面的合理性,从某个角度看是合理的,从另外的角度看,却是非理性的。

技术理性问题反映了人类实践的有限性特点,为我们清醒地认识人类自身提供了一面镜子。人类的本能是要追求无限,成为自身命运的主宰,但是这种追求一定要借助某种手段,技术就是这样的手段,在追求无限的过程中,手段往往取代了目的本身,人对无限的追求,最后就变成了对技术的崇拜。人在追求技术的过程中,自信心往往膨胀,发生一种“理性的傲慢与狂妄”,结果会有可能转变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技术合理性成为摧毁价值合理性的力量,这种危险情形在 20 世纪已经体现得很充分,从这个立场看来,我们需要技术理性批判,但它的作用毕竟不是唯一的。

人类实践的分裂、物质欲望和精神追求的分裂、技术和价值的分裂,是我们无法否认的现实,它们的统一,也是我们无法放弃的理想。我们一方面要立足于人的全面性的立场,始终把扬弃人的分裂和异化作为哲学的核心关怀,另一方面,对现实问题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和批判,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给我们的理论启示。

【参 考 文 献】

- [1] [德]韦伯. 学术与政治[M]. 冯克利,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2] [德]韦伯. 经济与社会[M]. 林荣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3] [德]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 李黎,郭官义,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4]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 启蒙的辩证法[M]. 纽约:连续统出版公司,1988.
- [5] [美]康纳顿. 启蒙的悲剧[M].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
- [6] [美]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张峰,吕世平,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 [7] [美]麦金泰尔. 马尔库塞[M]. 邵一诞,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 [8] 丁立群.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及其现代效应[J]. 哲学研究,2005,(1):34-40.

〔责任编辑:张 毫〕